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SSN 1005-6378,CN 13-1027/C

##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开平四集》的时间书写与历史内涵探论  
作者：刘育  
收稿日期：2024-04-10  
网络首发日期：2024-06-28  
引用格式：刘育.《开平四集》的时间书写与历史内涵探论[J/OL].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https://link.cnki.net/urlid/13.1027.C.20240627.1338.008>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 《开平四集》的时间书写与历史内涵探论

刘育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6)

**摘要：**袁桷的《开平四集》是元代上京纪行诗的代表作之一，源自其在元仁宗和元英宗时的四次扈从上都之旅。与一般上京纪行诗着意描绘沿途见闻或上都风情不同，袁桷的书写重在以文学为介质展现个体对于自然时间更替和历史时间变化的体验，在一种模式化的赋诗体式中寓意时代与心绪之变。一方面，作者通过与自我、他人及自然的不断“对话”，为《开平四集》注入了流动的时间性意涵；另一方面，其晚年对于四次上京纪行诗作的合编行为也赋予这部作品以时世变迁的历史性价值，显示出袁桷作为史家的深刻自觉。

**关键词：**《开平四集》；袁桷；时间书写；历史内涵；史家自觉

元代文献记载，“皇朝建国之初，四征不庭，靡暇安处，世祖皇帝定两都以受朝贡，备万乘以息勤劳，次舍有恒处，车庐有恒治，春秋有恒时，游畋有度，燕享有节，有司以时供具，而法寓焉。此安不忘危，贻子孙万世之法者也。故列圣至于今率循而行之”<sup>[1]</sup>。在这一过程中，“宰执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职分官扈从”<sup>[2]</sup>，由此往返于大都（今北京）和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之间的文人们缘事而发，因由旅途带来的种种感受，或形绘山川河流，或叙写个中场景，创作着独有元代特色的上京纪行诗<sup>①</sup>。袁桷的《开平<sup>②</sup>四集》是这类作品中的突出代表之一。

袁桷（1266—1327），字伯长，号清容居士，庆元四明（今浙江宁波）人，

收稿日期：2024-04-10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曲体与金元古都文化研究”（21WXA001）

作者简介：刘育（1984—），女，青海西宁人，北京大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四川省“天府峨眉计划”青年人才，主要研究方向：宋元文学与文献。

<sup>①</sup> 一般来说，上京纪行诗是一个与文人扈从元帝前往上都的行为紧密关联的概念。由于本文讨论的对象确属扈从上京之作，论述关注的重点之一亦在于作为扈从文人的作者心态，因此也主要将上京纪行诗理解为两都巡幸制度催生的文学产物展开讨论。但需要说明的是，现实情况中也有一些文人是被派驻到上都任职，在非扈从的公务之行中进行相关创作；又由于元代地域广大，游历风行，所以也存在出于个人行为的上都之行，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对上都完全陌生的旅行者们同样可能产生文学上的灵感。因此严格说来，上京纪行诗并不全然特指两都巡幸中的扈从诗。

<sup>②</sup> 开平与上京、上都意指为一。据《元史·地理志》：“上都路，唐为奚、契丹地。金平契丹，置桓州。元初为扎刺儿部、兀鲁郡王营幕地。宪宗五年，命世祖居其地，为巨镇。明年，世祖命刘秉忠相宅于桓州东、滦水北之龙冈。中统元年，为开平府。五年，以阙庭所在，加号上都，岁一幸焉。”参见宋濂：《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49-1350页。

《元史》卷一七二有传。其《开平四集》分别创作于元仁宗（1311-1320）延祐元年（1314）、延祐六年（1319），以及元英宗（1320-1323）至治元年（1321）、至治二年（1322）。从表面上来看，这仅仅是袁桷以文臣身份先后四次扈从两代君主在大都与上都之间往返的文学化记录，因此学界讨论及此，大多基于作品的纪行属性探索创作者在地理转换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sup>①</sup>。但是，当我们注意到袁桷晚年有意识地将写作时间跨度近十年的四次小集结为一编，那么《开平四集》可资研究的角度和意义就和其他上京纪行诗有了显著的区别。

## 一、“标准化”上京纪行诗视野中的《开平四集》之特异

一般认为，上京纪行诗“可分为途中纪行诗和上京风情诗两类。途中纪行诗对大都至上京之间昌平、榆林、居庸关、龙门、赤城、独石、牛群头、明安驿、李陵台、桓州等驿馆及风物都有细致刻画。上京风情之诗对上京风情、帝王巡行、诸王朝会等蒙古习俗多有描绘”<sup>[3]</sup><sup>802</sup>。也就是说，其主要写作对象可以进一步细化为空间以及空间内的风物、习俗等。举例而言，相较于《开平四集》，更为后世熟知的元代上京纪行诗代表作《上京纪行诗》（柳贯作）、《扈从集》（周伯琦作）、《滦京杂咏》（杨允孚作）等，就主要围绕途中纪行和上京风情的主题展开，体现了上京纪行诗的典型样貌。如柳贯在其诗序里写道：

贯以国子助教分教北都生，始出居庸，逾长城，临滦水之阳，而次止焉。自夏涉秋，更二时，乃复计其关途览历之雄，宫御物仪之盛，凡接之于前者，皆足以使人心动神悚。而吾情之所触，或亦肆口成咏，第而录之，总三十二首。<sup>[4]</sup>

在这样的创作动机下，阅读上京纪行诗的人自会产生如下一种感受：“目所及，穷西北之胜，其江山人物之行状，殊产异俗之瑰怪，朝廷礼乐之伟丽，与凡奇节诡行之可警世厉俗者，尤喜以咏歌记之，使人诵之，虽不出井里，恍然不自知。”<sup>[5]</sup>这段关于《滦京杂咏》的观后感与柳贯诗序的不谋而合之处，展示了上京纪行诗的“标准化”写法与“标准化”读法。

以此为背景，不妨说上京纪行诗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标准化”的研究方法。例如这通常是一个很容易以空间概念被分析解读的诗歌类别，有的研究者称此为“新空间场域中的诗歌实践”<sup>[6]</sup>，也有的学者带着“袁桷以怎样的角度观看和理解上京？《开平四集》究竟赋予了上京的城市空间何种意义？又是什么样的事物刺激着书写者的感官，让他调动书写成规、意象与场景，以诗这一媒介再现

<sup>①</sup> 直接与此相关的研究主要有：邱江宁《元代上京纪行诗论》，《文学评论》，2011(2)，135-143；李嘉瑜《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空间书写》，台湾里仁书局，2014；刘宏英《元代上京纪行诗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俞乐《元代上京纪行诗研究——以袁桷〈开平四集〉为中心》，湖北大学硕士论文，2019；赵称源《袁桷〈开平四集〉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2022。

他眼中所见、心中所感的城市”<sup>[7]153</sup>等问题意识，从城市空间的角度为《开平四集》设计专论。再如邱江宁提到的，“包括周伯琦等人在内所进行的大量上京书写是伴随着元王朝流动的政治中心而诞生的，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最值得人们注意的新质在于，人们对草原‘丝路’行程所见所闻的纪实书写，突显的不是抒情者的个体理想和情绪状态，而是流动中的异样风情与别种文化”<sup>[8]</sup>。因此可以说，在空间概念与视野主导下的上京纪行诗写作，其中心任务并不在于表现“抒情者的个体理想和情绪状态”，相应地，写作者寄予文字之间的个人化感受也鲜少成为上京纪行诗研究中的侧重点。

然而，通过观察《开平第一集》《开平第三集》《开平第四集》的小序内容和《开平第二集》创作当年的作者心绪<sup>①</sup>却可以看到，与其他多以记录风土人情为主题的同类别作品不同，袁桷的上京纪行诗是充满个体因子和情绪要素的。不仅如此，其个性化的部分还串联起了一条较为清晰的书写脉络，呈现出了时间的流动。其中，一、三、四集的小序分别写道：

延祐改元五月三日分院，十五日始达开平，得诗数篇，录示儿曹。<sup>[3]801</sup>

至治元年……四月甲子，扈蹕开平。与东平王继学待制、陈景仁都事同行，不任鞍马，八日始达。留开平一百有五日，继学同邸。八月甲寅还大都，得诗凡六十二首。道途良劳，心思凋落，姑录以记出处耳。<sup>[3]835</sup>

至治二年三月甲戌，改除翰林直学士。四月乙丑，出健德门，买小车卧行，八日至开平，舍于崇真宫。有旨，道士免扈从。官中阒无人声，车驾五月中旬始至。书诏简绝，仅为祝文十三道，已入内制。悲愉感发，一寓于诗。而同院亦寡唱和，率意为题，得一百篇。闰五月，上幸五台山，以实录未毕，趣史院官属咸还京。是月丁巳发，癸亥还寓舍。五月，滦阳大寒。闰月，道中大暑。观是诗者，亦足知夫驰驱之为劳，隐逸之为可慕也。<sup>[3]863</sup>

可以看到，和此后语辞更多的三、四集小序相比，“延祐改元五月三日分院，十五日始达开平”的记录，类似于日记体开篇“某时某地”的定时定位式说明，虽然缺少感性色彩，但是对于初次扈从上都的袁桷来说，这恰恰透露了一次陌生的旅途让一个初来乍到者特别在意的要点：行期与目的地。作为大都翰林国史院的一员，袁桷自然而然会对暂驻上都期间的“职场环境”有所好奇，因此，当他严谨地在年月日后写下“分院”二字时，诗人的姿态想必是虔诚而满怀期待的。与此同时，当首次扈从体验结束亦即《开平第一集》完成后，“得诗数篇，录示儿曹”的总结也隐隐表达出袁桷于此行之中不无自得的情绪。

至于延祐六年（1319）创作的《开平第二集》，诗人并未系以小序，但根据其当年写就的五言长诗《鲁子翬御史分按辽阳作长律五十韵爱其精密予今岁亦扈

<sup>①</sup> 按，《开平第二集》前无小序。

《开平因次其韵》<sup>①</sup>来看，彼时袁桷的心绪已是非常复杂，他一方面有着“解鞍心惘惘，执轡念兢兢”的某种伤感和顾虑，一方面却又在不忘歌颂仁宗“皇威宣绝漠，阳泽散坚冰”、祝福时代“盛化乾坤辟，王纲日月恒”的同时，对友人剖白曰“共知心耿耿，相对发髻髻”<sup>[3]486-487</sup>——在元代历史上，仁宗朝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时代。仁宗曾经锐意进取，更张政事，其间的成果是清晰无疑的，所谓“自居潜宫，深厌吏弊。及其即位，仍出独断，设进士科以取士”<sup>[3]2249</sup>形容，描述的正是一个年少有为的明君之姿。但他受制于太后答己，逐渐变得少有作为，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尤其是在立储问题上，仁宗破坏了他和兄长武宗之间兄终弟及进而叔侄相传的帝位继承约定，由此埋下了巨大隐患，使得皇位争端层出不穷以致乱象丛生，直接加速了朝代的衰亡<sup>[9]</sup>。正如杨维桢所言，“盛极则亦衰之始”<sup>[10]</sup>——当整个王朝站在了由盛转衰的节点，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敏感的文人自有感知。

因此，如果考虑到上述诗作的第一受众李鲁翀正是一位不满于元仁宗朝后期政治乱象并最终辞官以示抗议的朝臣<sup>[11]4220</sup>，那么无论是“惘惘”中流露的失意，“兢兢”中暗示的不安，还是“心耿耿”与“发髻髻”之间存在的矛盾，实际上都暗喻了袁桷对这个时代瞬间的感受，显露出“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sup>[12]</sup>一般的儒者情操。与此同时，这种情操亦内化于文学写作：即便时移世易，诗人明明清楚很多东西已经在时间流动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但他仍然带着对于仁宗及其时代的希望鼓励友人，亦是为自己打气。当内心的愤懑消解于温婉含蓄的字词之间，这也可以说是袁桷对儒家诗学的领悟和践行。

其后，当时间行进到英宗朝，诗人的心态发生了更多的转变。他在《开平第三集》小序中写“道途良劳”，可见在第三次扈从上京之后，旅途的辛劳已经取代了初次体验时的新奇与意气；“心思凋落”则更加直接地将前两集创作的时代背景和作者心绪纳入参照系，以充满沉郁之气的词汇“凋落”来形容此时此刻的低谷状态；至于“姑录以记出处耳”，更是少了《开平第一集》时“得诗数篇，录示儿曹”的风发和自得。

及至《开平第四集》，袁桷仍然提到了“驰驱之为劳”的问题，不过与上一集小序直言“道途良劳，心思凋落”但未作详解不同，这一次他的心绪似乎更为复杂。诗人首先表明了自己已不堪鞍马、只能“买小车卧行”的身体状态，其次将话题转向了此行居所崇真宫“阒无人声”的静谧——虽然袁桷给这种感受的由来找到了一个客观原因：英宗下旨“道士免扈从”，然而，崇真宫作为上都地位最重要的道观，本就有道士长驻于此，加之其又承担着上都文化中心之一的职能，平时“来到上都的文人常把崇真宫作为住宿或游赏聚会之地”<sup>[13]</sup>，因此诗人在

<sup>①</sup> 鲁子翀即李鲁翀。据史传记载，李鲁翀是在延祐五年（1318）“拜监察御史……巡按辽阳。”（参见《元史》卷一八三《李鲁翀传》，第4219页）。故可推断袁桷该诗为二次扈从上京前所作。

小序里宕开一笔专去描述环境上的寂无人声，无疑也是一种主观心境的投射，是彼时彼刻的袁桷以我观物的结果。最后，“悲愉感发，一寓于诗。而同院亦寡唱和，率意为题，得一百篇”的说法，不仅直截了当地表达了第四次上京之行的寂寥，而且按照诗人在这样的创作动因下得诗百篇的因果逻辑，我们再来反观《开平第三集》得诗六十二首、《开平第二集》得诗四十一首、《开平第一集》得诗二十六首的成果，那么发生在《开平四集》中的情绪变化与时间流动则又可以从逆推的视角得以证实。

## 二、“对话”中的时间书写

从上述关于《开平四集》诗序的解读可以看到，袁桷在上京纪行诗的创作中明显融入了他对时间的感知。那么如若将视线进一步聚焦到各集内的具体诗篇，这样的感知又将如何被书写和呈现呢？本文以为，诗人在《开平四集》中持续不断地与自我、他人及自然“对话”，就是他所找寻到的路径。

首先，袁桷的上京纪行诗表现出显著的与自我“对话”的倾向，有一种对于生命感受和自我情绪的执着关注。对所有初次访问上都的人来说，一次陌生行旅的沿途见闻、一座陌生城市的人事种种，理应是极具吸引力的观察对象，但是袁桷却从《开平第一集》时就已表现出强烈的个人化倾向。一方面，从外在形式上看，该集中二十六首作品仅有九首属于记载途中风光的典型纪行诗，其他篇目则或为酬答社交，或为题图、怀古以抒怀；另一方面，从具体内容上也能看出，袁桷与自我“对话”的意识是很明显的。他在《渡怀来沙碛》一诗的最后两联写道，“谬膺翰墨选，远行有期程。回头望南坂，初月随风生”<sup>[3]804</sup>，看似自谦，实为自豪。元帝巡幸两都的行程与归期大致都有定数，因此诗人说“远行有期程”除了实指扈从本身，或也有从宦途意义上对内心期待所作的自我回应。此时的袁桷显然是意气满满的，当他回首南望，诗人看到的是初升之月，这恰如延祐改元带给人的感受一样，是一种充满积极和奋励意味的暗示。相反，到了《开平第三集》及《开平第四集》时，相似的场景唤起的却是另一番感知：袁桷或是“眼望南雁传乡书”<sup>[3]837</sup>，“南望心徘徊”<sup>[3]846</sup>，由观看行为引发的结果更在于内心而非表象；或是“忽见婵娟新月上，却疑身似梦中归”<sup>[3]857</sup>，“是时新月出，归雁飞踟蹰。疑我久离乡，问我今何如”<sup>[3]870</sup>，在同样的望月场景中似乎已物是人非，脑海里全然是再也挥之不去的愁思。

可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南方人，难道说初次从大都前往北之更北的上都时，袁桷会毫无乡愁吗？当然不是。例如在遭遇闷热天气时他毫不讳言“暑溽想南州”<sup>[3]803</sup>，但因为彼时正身处一个万象更新的时代，所谓“仁宗初政，风动天下”<sup>[11]4108</sup>，因此在这一时期，比起离家之思，诗人显然更关注人生志向。《开平第一集》中

有《云州》诗曰：

天阔云中郡，刚风起沆寥。毡房联涧曲，土屋覆山椒。幢布朝朝市，通薪户户烧。遥看尘起处，深羨霍嫖姚。<sup>[3]807</sup>

虽然行至中期，元代早已完成开疆拓土的事业，但袁桷却写下了这首近似初盛唐边塞诗味道的作品：和数百年前的唐代诗人们一样，所见所闻既乃实际体验，所思所想亦是追慕英雄功业。应该说，《开平第一集》背后的主人公，深怀身逢盛世明君而冀望有所作为的雄心壮志。然而，美人迟暮、英雄白头是世间之人难以逃避却又无可奈何的共同命运——仅仅是五年光阴逝去后，袁桷已开始屈服于身体变化所指向的个体生命的衰落。他在《开平第二集》里说“渐恨鬓毛斑”，“渐知尘骨换”<sup>[3]823</sup>，“渐”之两提写出了—一个敏感心灵对于个人生理机能衰退过程的清晰感知以及又奈此何的无力。

随着时间的继续流逝，《开平第三集》中的作者已没有了吟诵“谬膺翰墨选，远行有期程”时的自豪与期待，相反，他说自己“足弱跨鞍窘，喋喋询前途”<sup>[3]845</sup>，诚实并且生动地让一个脚力不支致使上马困难、心有不安所以喋喋不休的自我形象跃然纸上；又说“年衰胫力拘，望远弥窘步……深知非世才，归耕誓先墓”<sup>[3]848-849</sup>，不惧承认只能平凡以终老的现实。

最终到《开平第四集》时，扈从之行中的沿途见闻或者上都风情似乎都已很难吸引袁桷的注意力，他在本集第一首诗作《端午日由车中抵开平客中三度端阳怆然有怀》中就毫不讳言道，“旧岁滦阳万寿宫，九节菖蒲泛琼醕。今年车中饱掀簸，盲风北来雨如注”<sup>[3]864</sup>——曾经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上都宫宴，而今让人难以忘怀的却是身心经历的旅程艰辛。正如诗人在本集小序中自言的“悲愉感发，一寓于诗”，这一阶段他绝大部分的兴趣和笔力其实都在于审视自己的内心，关注自我的情绪，在流动的时间视野中让袁桷和袁桷发生“对话”。例如《客舍书事八首》其一、其二、其七分别写道：

客景真愁绝，凄凉倍旧年。草穿沙嘴缩，云住屋头偏。灶冷厨烟湿，窗低檐溜悬。畏寒难出户，尽日得高眠。

日永空庭净，清斋罢煮茶。无羊谁阅市，有客共思家。巷近逢归马，门闲数过车。衰年行六十，那得老风沙。

宿雾成疏雨，寒蓬卷细尘。云飞疑到地，草长不知春。香几蜂喧密，花房燕语真。白头关塞外，犹作未归人。<sup>[3]874-876</sup>

可以看到，无论是在“灶冷厨烟湿，窗低檐溜悬”的寒日，还是“日永空庭净，清斋罢煮茶”的闲日，抑或是“香几蜂喧密，花房燕语真”这样富有生机的一天，每当要从“书事”升华到“抒怀”的时候，诗人总在用一种比较的目光来看待过去和现在，于是有了“凄凉倍旧年”“衰年行六十”“白头关塞外”之类的慨叹。

在岁月流转、时不我予的遗憾里，袁桷在延祐初表露出的“遥看尘起处，深羨霍嫖姚”之志，至此却成了“万里功名头竟白，张骞何事苦乘槎”，“往岁曾为大鹏赋，今秋且作小山词”<sup>[3]865-866</sup>的自我感喟。他就像一个预言家，以对个体生命变化的敏感察觉并透露着时代之变。

其次，袁桷的上京纪行诗也表现出善于与他人“对话”的特点，在充分发挥诗歌社交功能的同时，同样寄予着诗人对时间的深刻认知。此种现象自《开平第二集》开始突显，到《开平第四集》时最为集中。在《开平第二集》伊始，诗人有《再次韵答李彦方应奉》诗云，“良会难俱陈，岁月流颓波。念昔邂逅初，黑发云冠峨……瞬息已廿载，愧彼桑干河”<sup>[3]819</sup>，即是以回忆贯穿全篇，寓意着鲜明的时间概念。无独有偶，在另一首题为《送金华王生》的诗中，袁桷同样以对时光匆匆的感慨起笔落笔道，“不到金华洞，于今二纪余……江湖易衰感，暂且问渔樵。”<sup>[3]834</sup>此外，他还在一篇咏唱上都的作品里写“昔年曾扈跸，宿直对鳌峰”<sup>[3]826</sup>——从空间书写角度研究上京纪行诗的学者曾就其中提到的“鳌峰”<sup>①</sup>即上都翰苑庭中的一块太湖石提出，“作为记忆现场（memory site）的鳌峰，袁桷在此不只铭刻着他自身的感受，也与过去、未来的书写者产生了交流，进而丰富了翰林院的空间意涵”<sup>[7]167</su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首次韵自身作品的诗歌虽然在表面上是自言自语，实际却也是借鳌峰实现了与其他翰苑到访者关于时间话题的隔空对谈。

不过相较而言，《开平第二集》呈现的时间流动是含蓄的，诗人的“对话”对象是一个个鲜活的存在，袁桷是在探寻双方过往记忆交集的过程中表达自己对时间的感知。彼时，尽管参与交流的另一方没有在读者面前直抒胸臆，但酬答作品的属性却让人不难想见他们可以在袁桷诗中找到的共鸣。然而到了《开平第四集》时，袁桷却不得不直面巨大的时间之殇：他想要“对话”的他人，很多都已经在现实世界里缺位了。

在分别为三位故去友人所作的三首感怀七律中，诗人无一例外地使用了散文化的长题以示内心言说不尽的哀思，其一曰《卢彦威与余同为待制，下世已八年。睹行院题名旧迹感怆写情》，其二曰《元复初学士旧岁同官集贤，会于上都。改除翰林学士，见其饮酒数十觥，倍常时。今年以疾卒不起。睹行院题壁为四韵以挽》，其三曰《潘景梁学士同在集贤，朝夕与余论宏词源委，后俱罢去。新政肇更，皆得复入。旧岁同会上都，景梁还都不一月下世，僕忝入翰林。过视草堂有感》<sup>[3]873-874</sup>——三则诗题无疑都具有明晰的时间性内涵<sup>②</sup>。特别是在第三题当中，

<sup>①</sup> 鳌，同“鳌”，袁桷在其他提到该石的诗中都作“鳌峰”，惟此处作“鳌”，中华书局和浙江古籍出版社的两种袁桷别集点校本均作此处理，从之。

<sup>②</sup> 按，原诗题在本文主要依据的中华书局版校注本中无标点，但为更清晰地呈现其中的时间性内涵，笔者在行文中略为断句。

袁桷还专门提到了“新政肇更，皆得复入”之事。结合诗人曾于元武宗（1307年—1311年在位）至大三年、四年（1310—1311）间“居家休养”<sup>[3]2446</sup>，后于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十月北上大都“蒙恩复授旧职”<sup>[3]2452</sup>的个人经历可见，《开平四集》里无处不在的时间流动不仅体现在袁桷身体的衰老和心思的凋落，其根源更在于时移世易——他周围的人事乃至整个时代都在这段不长不短的时间里发生着变化。《开平第四集》中又有《视草堂岁久倾圮述怀二首》曰：

视草堂前草木青，微臣三入鬓星星。坏墙<sup>①</sup>雨透蜗生角，旧灶泥深菌露钉。深恐雨钟催晓箭，独听寒殿响风铃。堂堂诸老冰渐尽，病叟应归种茯苓。

昔时寿俊佩蹁跹，人物于今似眇然。倚马谁怜才独步，屠龙端信技无全。颁冰伏日金奩重，赐果薰风绮席鲜。可是虚皇疏顾问，玉堂旧事少人传。<sup>[3]882-883</sup>

视草堂对扈从上都的文人而言是一个熟悉的地标。根据胡助《上京纪行诗序》的记载，大致可知这是翰林国史院上都分院中的一处标志性建筑<sup>[14]</sup>，时人虞集、马祖常等皆有诗作咏之。与上述“鼇峰”案例的内涵相仿，袁桷再次通过一个空间实现了与他人的“对话”，并为此赋予了时间上的意义。只是，作为建筑物的视草堂比起太湖石鼇峰来说似乎显得脆弱许多，在经年累月的时光流转中，它的衰落与破败全在诗人眼中，因而比起《开平第二集》中提起鼇峰时的今昔之感，此刻视草堂的倾圮之状无疑引发了诗人更深的慨叹。应该说这一次袁桷不但是借“述怀”之题与自我“对话”，而且从“独听”“诸老”“人物”等细节来看，他的思绪里分明也在怀想着视草堂的其他观者。

再次，袁桷的上京纪行诗还展现出与自然“对话”的面向，无论是前往上都途中还是身在上都期间，他都格外留意大自然的时序及天气变化，对节气与温度特别敏感。在《开平四集》中，除了诗题中会有“雨中”、“伏日”、“晓霜”、“大寒”等相关字眼，具体内容涉及到这一方面的词句更是屡见不鲜，例如“山寒绝禽鸟，独闻子规啼。石壁飞雨骤，众木摇凄凄”<sup>[3]803</sup>，“马鸣知雹急，雁过识天凉”<sup>[3]822</sup>，“风花秋黯淡，云叶雨连绵”<sup>[3]825</sup>，“山巍磧瘦马透迟，尽日云阴变四时”<sup>[3]842</sup>，“墨云参差平地涌，碧窗淅沥寒风生”<sup>[3]850</sup>，“神京岁岁春夏交，干风卷尘喧四郊”<sup>[3]892</sup>等等。虽然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讲，自然界的雨雪风霜、春华秋实是自《诗经》起便有的普遍素材，但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在主旨理应是写上京纪行或上都风情的诗集里，作者频繁地关注季节、天气，其对于时间变换的敏感程度当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再来回顾一下《开平第四集》小序和柳贯《上京纪行诗》小序的异同，则更能见出袁桷与旁人不同的关注点。简单来说，尽管柳序中的“自夏涉秋，更二时乃复”也是写时光之变并暗含有旅途艰辛之意，但诗人提及时间的目的显然

<sup>①</sup> 按，“坏墙”，《袁桷集校注》作“怀墙”，笔者以清郁松年宜稼堂从书本《清容居士集》卷十六对校，核之为“坏墙”；根据诗意，亦当以“坏墙”为是，故改之。

更在于此后的一段话，即他于此期间“关途览历之雄，宫御物仪之盛”的视觉刺激和“心动神悚”的心理震撼，这才是柳贯的诗序以及诗篇意图表达的侧重点。相较之下，袁序写“五月，溧阳大寒。闰月，道中大暑”，直以两个通俗的“大”字来形容气候变化，可见诗人由此产生的感受已经强烈到他根本无暇也无意再就“寒”“暑”做任何文学化的修饰，尤其是在极致的天气对比后，袁桷遂以“观是诗者，亦足知夫驰驱之为劳，隐逸之为可慕也”结束了序言，愈发说明在他眼里，扈从之旅甚而人生之旅，总是与大自然的节令、物候不无关联。换言之，在《开平四集》中，时间也正于袁桷对自然的关注和与自然的“对话”中流动不息。

### 三、从书写到合集：史家思维中的“加减法”编辑

周伯琦《扈从集后序》写道：“非我元统一之大，治平之久，则吾党逢掖章甫之流，安得传轺建节，拥侍乘舆，优游上下于其间哉？既赋五言古诗十首以纪其实，复为后序以著其概，不惟使观者得以扩闻见，抑以志吾生之多幸也欤。”<sup>[15]</sup>同样是结束旅程后的个人感受，《开平四集》反映出的情境明显与此不同。虽然说《开平第一集》序言中“录示儿曹”的潜台词多少也有周序里“使观者得以扩闻见”的意思，但是到了《开平第四集》时，袁桷意在令阅读者“亦足知夫驰驱之为劳，隐逸之为可慕也”的背后，浮现的则是他在多年的扈从亦即宦途间体会到的深深寥落。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扈从集”和“开平集”在字面上指涉的都是同一主题的创作，但周伯琦和前文提到的柳贯、胡助、杨允孚等相仿，借由上京纪行诗体裁完成的更像是一部部气势恢宏的官方宣传作品，而袁桷却在内容和情绪上掺入了相当程度的个人意志，能够让人从中读出绝对的私人属性。他在《开平第四集》的最后一首诗里说，“竹簟暑风茅屋下，它年拟作画图看”<sup>[3]898</sup>，亦有日后将欲借此自娱自乐之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袁桷主动对前后跨越近十年的四个小集进行合编的行为发生时，这种私人性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取而代之的则是文本由此产生的、对时代变迁形成回应的公共性历史价值。

“书写者袁桷所记录的可以是现在、这里、此时此刻所经验的，编辑者袁桷却是从回溯的角度进行检视，确认那些文字之于编辑时的意义。”<sup>[7]157</sup>这是李嘉瑜讨论为什么“第五次上京旅程的经验是他不愿收编与回忆的”这一问题时提出的解释，她注意到了《开平四集》从分次书写到编为一集的过程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由此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将袁桷先后书写《开平第一集》《开平第二集》《开平第三集》《开平第四集》，进而将它们合编为《开平四集》的内涵扩展到一种史家的自觉。据苏天爵所记，袁桷“长从尚书王公应麟讲求典故制度之学，又从天台舒岳祥习词章，既又接见中原文献之渊懿，故其学问核实而精深”<sup>[3]2248</sup>。

可见他的史学素养是深有根柢的，其后来执笔《延祐四明志》的实践工作，以及由此获得的“《志》中考核精审，不支不滥，颇有良史之风。视《至元嘉禾》、《至正无锡》诸志，更为赅洽”<sup>[16]601</sup>等好评，更充分证实了他在这方面的出众能力。最为难得的是，当元廷终于开始修撰宋、辽、金三史之际，“先朝故老存者无几，众独于公追思不忘。会遣使者分行郡国，网罗遗文古事，而江南旧家尚多畏忌，秘其所藏不敢送官。公之孙同知诸暨州事曦乃以家书数千卷来上。三史书成，盖有所助”<sup>[3]2249</sup>。可见袁桷不仅因其深厚的史学功底为人挂怀，更以明确存史意识下的宏富藏书为三史之成提供了实质性的助力。因此，这样一个从理论到实践都彰显着史家风范的创作者，当他意图将写于过去不同时期的文字置于一处、合为一体的时候，不会没有注意到潜伏其间的时移世易。在本文看来，让原本文学化的文本附着上厚重的历史化意味，这是《开平四集》从书写到合集的过程深意。

有研究者提到，“自仁宗朝开始，他似乎驶上快车道，一路快速前进，在英宗朝达到宦途的顶点”<sup>[17]</sup>。这当然是与袁桷自元成宗（1294年—1307年在位）时进入仕途后的发展速度进行对比后得出的结论。换言之，因为袁桷是曾在元仁宗时代受到重视和优待的对象，所以《开平四集》里无处不在的时间意识就有了一个合情合理的成因阐释。借用戴表元的一番比喻来说，“浙东西之山水莫美于杭，虽儿童妇女未尝至杭者知其美也。使之言杭，亦不敢不以为美也。而不如吾二人之能言，何者？吾二人身历而知之，而彼未尝至故也”<sup>[18]</sup>。作为同样曾经显遇于仁宗时代的一员，袁桷可能比早早选择远离大都的贯云石<sup>[19]</sup>更加了解其间时事，也必然较至治年间离世的赵孟頫<sup>[20]</sup>更加清楚此后的政治巨变，因此当他将四次扈从上都的《开平第一集》《开平第二集》《开平第三集》及《开平第四集》合编为一集之时，其实也就意味着那个对仁宗朝以及后仁宗时代的英宗朝“身历而知之”的人，正在以一种全知视角来回顾和回味十数年间的世情起落、气象浮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开平四集》的本质虽然是文学文本，却也充分回应或反映着时事，暗合了“身处其中者往往到该周期结束才能察觉其终始之间发生了多大的时代差异与历史变动”<sup>[21]</sup>的中时段历史研究意义。

固然，有研究认为周伯琦创作《扈从集》和杨允孚创作《滦京杂咏》的原动力也都是保存史料、以诗存史<sup>[22]</sup>，若以此观之，周、杨当然也具备史家的自觉。但是《开平四集》的特殊性在于，表面上这是一次将四集合为一集的“减法”式编辑，然而文本最终呈现的展示方式却由一个个原本单独存在的小集，增扩到了一套拥有四集容量的上京纪行诗合集，这种本质上又为“加法”式的编辑最终将跨越其间的时光重聚于文本，使平白无奇的文字显现为更加鲜活可感的历史，文学文本因由编辑工作注入历史内涵，从平面变得立体而厚重。故此，《开平四集》

作为上京纪行诗之一种，自有其可在空间、风俗、地理等常见层面予以发掘的价值；与此同时，从书写到合集，它所展示出的独出心裁的时间性内涵更富探究必要。如果说扈从上都的文人们勤于创作的背后都有试图以诗存史的愿景，那么袁桷在纯粹的书写之外，又通过“加减法”编辑将元仁宗时代气象兴衰的时间点进行叠加、复合，最终呈现出历史行迹的做法当然有其不同寻常的特点与价值。

综上所述，《开平四集》的书写与合集在文学史的视野中或许只是寻常的一环，它最为人称道的意义就在于为其后几十年间上京纪行诗创作的勃兴状态做好了铺垫，提供了一种展示模型<sup>①</sup>。但是，如果透过现象发现本质，我们会看到袁桷如何用这种模式化的赋诗体式包容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书写生命历程的沧桑与历史兴衰的进程。四库馆臣在评价袁桷的文学表现时，曾称赏其“文章博硕伟丽，有盛世之音……其诗格俊迈高华，造语亦多工炼，卓然能自成一家。盖桷本旧家文献之遗，又当大德、延祐间为元治极盛之际。故其著作宏富，气象光昌，蔚为承平雅颂之声。文采风流，遂为虞、杨、范、揭等先路之导。其承前启后，称一代文章之钜工，良无愧矣”<sup>[16]</sup><sup>1435-1436</sup>。应当说，无论从书写还是合集的意义上而言，《开平四集》都为这段评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 结 语

袁桷的扈从之旅暨仕途通达之机恰于仁宗朝初期的盛世开始，《开平四集》的书写与合集则是以一种含蓄而艺术化的方式反映了仁宗时代的结束，宣告着时移世易的人事更替。在本文看来，这是袁桷作为“一代文章之钜公”所发挥的正常笔力，更是他志在存史立场下理所当然的创作成效。总体而言，关于《开平四集》及其时间性内涵的讨论，是一个既有助于理解袁桷也有益于了解元代中期历史语境的过程，这也是《开平四集》和其他上京纪行诗相比与众不同的存在意义和解读视角。所谓“声音之为世道耶？世道之为声音耶！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矣”<sup>[23]</sup>，或可借以形容袁桷及其《开平四集》与时代之间彼此涵容的互动关系。

---

### 参考文献：

<sup>[1]</sup>赵世延. 经世大典序 [M] //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67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07.

---

<sup>①</sup> “袁桷将自己的上京之行咏于诗，遂有《开平集》四集，此后上京纪行诗作逐渐繁盛。”参见邱江宁：《元代上京纪行诗论》，《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第136页。又，李嘉瑜认为《开平四集》“为之后的上京书写提供了参考的范式（paradigm）。”参见李著《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空间书写》，台湾里仁书局2014年版，第148页。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的论述理念中，《开平四集》的书写与合集，在文学史的视角下体现的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意义：它的书写诱发了此后上京纪行诗创作的勃兴状态，它的合集展示了上京纪行诗可以如此呈现的一种模型。

- [2]黄溍.上都御史台殿中司题名记 [M] //李修生.全元文:第29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300.
- [3]杨亮.袁桷集校注 [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4]柳贯.上京纪行诗序 [M] //杨镰.全元诗:第25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138.
- [5]罗大己.滦京杂咏后跋 [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27.
- [6]武君.元代上京纪行诗评及其理论成果 [J].文史,2017(4):229-252.
- [7]李嘉瑜.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空间书写 [M].台北:里仁书局,2014.
- [8]邱江宁.海陆“丝路”的贯通与元代诗文的独特风貌 [J].文学评论,2017(5):121-130.
- [9]傅海波、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 [M].史卫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98.
- [10]杨维桢.王希赐文集再序 [M] //李修生.全元文:第4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229.
- [11]宋濂.元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2]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M] //全唐诗:卷二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99:2266.
- [13]陈高华、史卫民.元代大都上都研究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74-275.
- [14]胡助.上京纪行诗序 [M] //李修生.全元文:第3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501.
- [15]周伯琦.扈从集后序 [M] //李修生.全元文:第44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534.
- [16]永瑢.四库全书总目 [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7]李军.袁桷集·前言 [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6.
- [18]戴表元.赵子昂诗文集序 [M] //李修生.全元文:第12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97.
- [19]刘育.贯云石文学新论——以其在元仁宗朝的命运转向为视角 [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78-85.

- 
- [20] 刘育. 仁宗朝的赵孟頫新议 [J]. 中国诗歌研究, 2019(2): 97-111.
- [21] 虞云国. 南宋行暮: 宋光宗宋宁宗时代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1.
- [22] 刘宏英. 元代上京纪行诗研究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6:170.
- [23] 赵文. 吴山房乐府序 [M] //李修生. 全元文: 第10册.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4:71.

(责任编辑 卢春艳)

## **A Study on the Temporal Writing and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Kai Ping Si Ji***

Liu Y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6, China)

**Abstract:** *Kai Ping Si Ji*, which was written by Yuan Jue, w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Shang Jing Ji Xing Poetry in the Yuan dynasty. It came from Yuan Jue's four experiences of accompanying the Emperor Renzong(仁宗) and Yingzong(英宗) to Xanadu(上都). Unlike the common Shang Jing Ji Xing Poetry which focused on describing local conditions and customs, Yuan Jue's writing showed the individual feelings of natural time change and historical time change. It also implied the changing times as well as his different emotions while breaking through a stereotyped writing way of Shang Jing Ji Xing Poetry. On the one hand, *Kai Ping Si Ji* was given a fluid meaning of time through unceasing conversation with Yuan Jue himself, with others, and with nature. On the other hand, Yuan Jue co-edited these works in his late years. This action also showed his deep consciousness as a historian and endowed *Kai Ping Si Ji* with particular historical value.

**Keywords:** *Kai Ping Si Ji*; Yuan Jue; Temporal Writing;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Consciousness of a Historian